

投筆肤談說

崔
强



崔
强

投筆談說

解放军出版社

投笔肤谈浅说

崔 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48 千字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065-0786-2/E·398

定 价： 2.20 元 (压膜 2.5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的兵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仅存留到今天的兵书就有四五百种之多。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不仅在军事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技术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以阐述战略战术为主的兵法，影响更大，声誉更高。它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育了众多的著名将帅，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并逐渐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传，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军事人物爱不释手和极力推崇的著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它是我国一笔珍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为了给更多的同志学习和研究古代兵法提供方便，特别是给我军广大指战员学习、借鉴我国古代军事理论提供方便，以便从中吸收更多的营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共约二十几种。第一种是《中国古代兵书杂谈》。它综合介绍了有关我国古代兵书的许多基本知识，象一把打开我国古代兵书宝库大门的钥匙，又象一位引导读者进入这座宝库的向导，让你在浏览中能够概略地了解什么是兵书，我国最早的兵书是什么，历代共有多少兵书，存留到今天的还有多少，兵书在史籍中如何著录，怎样分类，它们

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在世界的影晌，今天到图书馆去怎样查找兵书，怎样阅读兵书，以及兵书和兵法的不同涵义等。其余二十几种，是通俗地分别介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古代兵法，如《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繚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及影响较大的《孙臆兵法》、《武经总要》、《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一部兵法出一种书。每种书中既录有该部兵法的原文或主要内容，又有分篇或对其主要内容的译文和浅说，同时还对该兵法的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军事思想及其影响等问题作些简要介绍。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内容丰富，论述简明，让读者开卷受益。

由于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加上我们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军内外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利于不断提高这套读物的质量。

这套通俗读物的编辑和出版，得到许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郭化若、舒同等同志在百忙中为其中的一些书题签书名，亲笔作序。在此谨致谢忱。

一九八三年六月

序

崔强同志枉顾寒斋，送来了他的大作《投笔肤谈浅说》，并嘱我写一点介绍的文字。崔强同志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军事记者，写得一手好文章。或许是职业的缘故，他的《投笔肤谈浅说》确有流畅的文笔，新颖的角度，独到的见解；对于《投笔肤谈》这部具有鲜明主题和多层次结构的兵学作品的解说，应该说是把握了主旨的。

《投笔肤谈》，西湖逸士撰。这位西湖逸士不知究竟何许人也。他在引言中说，他写此书“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盖宗大圣人，窃比老彭之意也”。《投笔肤谈》是值得重视的，书中警言粹语，迥出古人，独辟蹊径，自成体系，在军事学术上有着较高的价值。这些价值，崔强同志已经作了详明而精到的分析。拾遗补缺，我在这里只就《投笔肤谈》所反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对立统一关系的问题。

军事斗争是最能说明矛盾规律的。在战争中，敌我双方那种相互斗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得到了最现实、最鲜明、最生动的反映。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家大多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西湖逸士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你看他对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认是多么深刻：“故知害之害者，知利之利；知危之危者，知安之安；知亡之亡者，知存之存。”西湖逸士正是在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点上，从分析敌对双方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入手，建立起他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他写道：“夫兵有营阵，有战守，有攻御，有彼己。善用兵者，审虚实之势，校轻重之权，量缓急之宜，度先后之节。”这里，“审”、“校”、“量”、“度”，无一不是从分析不同质的矛盾中总结出的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

西湖逸士不仅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而且在作战的具体原则上也同样贯穿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他说，行军开进时要“行虑其邀”，安营扎寨时要“居虞其薄”，接敌进攻时要“进思其退”，排兵布阵时要“外顾其中”。西湖逸士关于乘敌之隙的分析更是闪烁着辩证思想的光华，他指出：“天下之乘，不在敌，则在我；不在我，则在敌。故己可以乘人，而人亦可以乘己者，不可以不防。人或有不防己，而己亦可以谋人者，不可以不知。”总之，“居常虑变，处易备猝”，时时处处都不要出现形而上学的弊病，即使是“我强我众，亦防敌之乘我”，那么，就可以做到“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从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看到战争中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这仅是《投笔肤谈》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但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西湖逸士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兵学家。

通过西湖逸士的兵学理论来观察他的哲学思想，透过西湖逸士的哲学思想去评介他的兵学理论，这样，可以加深对

西湖逸士《投笔肤谈》的认识和理解。不知这一看法是否妥当，仅以此就教于崔强同志和读者同志们。

吴如嵩

1988年3月22日

前 言

《投笔肤谈》是一部成书于明朝末期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现有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陈汝忠弘锡堂刊刻的《音注武经七书》的附刻本传世。作者隐其姓氏，仅署名“西湖逸士”，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投笔肤谈》的真正作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然而，《投笔肤谈》上下两卷卷端下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音注武经七书》各卷卷端下题“何守法校音点注”。这便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区别，即《投笔肤谈》为何守法“撰音点注”，而《音注武经七书》则为何守法“校音点注”。撰者，著作意也；校者，谓之订正也。一字之差，似可认为“西湖逸士”即为浙江解元何守法。同时，《投笔肤谈》所征引的战例与掌故均不晚于宋。据查证，何守法当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人，这与《投笔肤谈》成书的时间也是相吻合的。再者，“西湖逸士”于《投笔肤谈·引》中说：“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这个自述说明作者并非武将，而是一个“不欲自限于博士业”的文人。由于以上原因，国内研究者的倾向性意见是，浙江解元何守法即为“西湖逸士”，是《投笔肤谈》的真正作者。

1965年，军事科学院原战争理论研究部古代兵法研究室和原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军事史料研究处的部分同志，共同

编写出版了《投笔肤谈》的译注本。这就为我们深入研究《投笔肤谈》及其在我国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为节省篇幅，本书在逐篇翻译原文时略去注解。《投笔肤谈》原书分为题解、原文、注解、注音和批评五部分。为避免重复，本书保留了题解、原文和注解三部分，注音和批评部分的参考价值不大，所以删去。为保证不失原意，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通俗易懂，表达准确。对无法直译的若干语句，则采用意译。原文中的注解部分因较易读懂，故不再翻译，以免累赘。

《投笔肤谈》是一部深寓哲理，学术容量相当宏丰的军事理论著作。我作为军事理论研究的一员新兵，在解说这部兵书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学力不足，难以驾驭。颇为庆幸的是，在我研究写作的时候，多次得到军事科学院古代兵法研究室副主任吴如嵩同志的指教，多次得到解放军出版社编辑陈济康同志的热情帮助，这才得以使这部学步之作与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投笔肤谈浅说》仅仅是研究这部军事理论著作的开端，疏漏谬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作 者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

目 录

前言	(1)
《投笔肤谈》的学术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1)
《投笔肤谈》原文、译文、浅说	(15)
上卷	(16)
《本谋》第一	(16)
《家计》第二	(36)
《达权》第三	(51)
《持衡》第四	(77)
《谍间》第五	(90)
《敌情》第六	(107)
下卷	(118)
《军势》第七	(118)
《兵机》第八	(133)
《战形》第九	(149)
《方术》第十	(161)
《物略》第十一	(171)
《地纪》第十二	(181)
《天经》第十三	(191)

《投笔肤谈》的学术特色 及其历史地位

《投笔肤谈》成书于明代末期，作者“仿《孙子》之遗旨”，全书分列十三篇。自《本谋》第一始，至《天经》第十三止，大致按所述问题在战争指导中的地位，依次排列，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联系。作者以孙子的战争理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历代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战争指导原则的各个侧面，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

—

明代中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新知识（近代物理知识、近代化学知识以及气象、地理知识等等）、新技术（机械、冶金、造船等技术）、新兵器（主要是各种管形火器）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尤其是随着明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各种矛盾相互制约的影响日益深刻，这一切，使得我国古代战争理论的发展终于敲响了近代战争理论的大门。《投笔肤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我国古代优秀的军事理论遗产，使作者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战争问题放在一个更宏大

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考察。因此，《投笔肤谈》在某些方面的论述就显得更加充分、更加具体、更加明确。

在作者看来，由于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士兵的训练素质与士气，武器装备与后勤保障，军队建制与部队管理，将帅素质与指挥策略的运用，地形与天候的选择，等等因素构成的。因此，与其认为战争是力量之间的较量，还不如认为战争是谋略运筹之间的较量更为准确。正因为这样，“以谋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作者对战争问题诸方面的论述过程之中。为了避免战争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夺取尽可能大的胜利，作者强调指出“谋乃行师之本，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作者按照我国古代兵学家“内谋于庙堂，外谋于战场”的基本思路，将谋略运筹作为核心，逐一展开全书的论述。作者的军事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次的表述上。

第一，关于战略谋划。这是战争谋略的最高层次，是战争双方为争夺战略主动权，在宏观范畴内展开的谋略运筹。作者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作为战略谋划的指导思想，认为战略谋划的目的就是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指导者凭借着这个主动，即可以造成“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的战略优势。运用战略优势，便可以在“不得已而必至于用兵”的时候，“不多旅，不久师，不暴卒，不角力”。因此，战略运筹是任何一个战争指导者都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关于作战运筹。战争，是敌我两大武装集团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利用地理地形、天候气象等各种可能利用的因素，在力与智的结合上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敌我双

方总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制造种种假象，欺敌误敌，诱敌就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指导者就必须正确地选择并尽可能创造有利的决战时机；就必须正确地确定作战方向和作战方式；就必须尽可能隐蔽地完成作战准备和战役部署。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战役主动权，而陷敌于战役被动。这是战争谋略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关于指挥策略的运用。在战争的发展进程中，战场态势瞬息万变。作者认为，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掌握“用兵之机括”，示形造势。作者认为，通过假象愚弄敌人，使敌信以为真，往往能够打破战役僵局，打乱敌军的部署和作战决心。比如，将我军的优势隐蔽起来，可以使敌轻信盲进而陷入战役被动；将我军的短处有意暴露给敌军，又可以使敌产生疑虑，猜忌，以至于错觉；将敌军害怕的因素掩盖起来，以此造成敌军防范松懈，可以为我创造战机；迎合敌军将领的某些心理，便可使敌意志昏乱；在战场态势的对比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的情况下，可以调动敌军，逐步剥夺它的主动权与优势。同时，战争指导者还必须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以“虚实藏势，向背藏机”的“所以战之形”，牢牢地控制战场主动权。这是战争谋略的第三个层次。

第四，利用科学与科学技术为战争服务，《投笔肤谈》区别于我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的又一个鲜明特点是，详尽地介绍了许多自然现象、自然界生物和物质的属性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尤其是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作者认为，“兵者，以巧取胜也”，“术不厌卑陋，艺不厌微贱，惟兵为然也”。利用军事工程技术，可以改变河流的走向，移动丘阜的位置，排干沼泽的积水，凿通险峻的高山，创造有利于我

而不利于敌的地形。“连鸡纵火，封鸽代谋，驯猕劫营，驱兽突重”，既可以改变敌我兵力对比的态势、减少我军有生力量的伤亡，又可以出敌意外，震撼敌军。因此，作者强调指出“知兵之士，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作者以大量篇幅介绍了“飞潜动植”等许多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的性质，论述了它们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且指出“兵不可泥于常法，当变通诡道以愚惑之”（愚弄欺骗敌军造成敌之错觉）。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将如何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为战争服务，作为战争谋略的又一个层次。

综上所述，在阐述战争谋略运筹的过程中，作者遵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采取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式，即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入手引出观点，然后再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在论证原则的时候，采取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即从战争理论的高度提出观点，然后再结合各种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加以论证。作者在战略谋划、作战运筹、指挥策略、以及如何运用科学知识与技术为战争服务等四个方面的论述，既宗师于我国古代兵学理论，又不同于我国古代兵学理论，具有其鲜明的学术特色。

二

应该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风俗的）影响日益广泛，日益深刻。同时，社会生活的这些方面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这就使得战争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把战争谋略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去运筹。

作者在《投笔肤谈·引》中说，“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经济萎缩，财政日绌，国运渐衰。这就迫使明朝在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军事斗争中不得不渐居守势。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国，明朝统治集团面临着国内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局势日益动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危机。同时，又面临着如何以武力反击南方之倭寇与北方之蒙元、女真等民族的侵扰问题。时代的危机，将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战略的抉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作者对战争谋略问题的思考与论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在阐述战略谋划问题时指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社会因素、和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等等自然因素，对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因此，作者提出了“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民不和不可以合战”的论断，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富”）与政治实力（“民和”）的消长，作为战略运筹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在这里，战略运筹的实际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军事战略的范畴，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战略的基本轮廓和要点。

作者从两个层次展开了这一问题的论述。

首先，作者总结了历代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民众劳苦而兴兵作战，军队就会疲惫不堪；民众贫困而兴兵作战，军队就会遇到重重困难；民众苟且偷安而兴兵作战，军队就很容易溃散；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内奸或谗臣而兴兵作战，军队就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天灾（瘟疫与水旱灾害等等）流行而兴兵作战，军队就会发生混乱；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致或出现纠纷而兴兵作战，军队就会产生疑虑和猜忌；统治阶级

与民众离心离德而兴兵作战，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战略的主要着眼点就在于，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民富而不贫、逸而不劳；调整国家的内部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民族关系），使国内社会安定，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巩固，上下同心同德。这样，才能掌握军事战略上的主动权，形成战略优势。

其次，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战争对国计民生的深刻影响，认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妨农则食不足”；影响到其它各种产业，“妨业则家益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经济，“妨财则日用竭”；影响到社会的凝聚力、统治阶级的权威和民众的生命财产等等。因此，作者强调指出，“是以不难于战胜，而难于不为斯民病；不难于杀敌，而难于不貽患于国”。在作者看来，单纯夺取战争的胜利（姑且不论其是否可能），还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战略家最困难的课题。对军事战略家来说，最困难的课题是：在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下，既“不为斯民病”又“不貽患于国”。这就要求军事战略家在指导战争的全过程中，考虑到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概念，统筹谋划，力争避免与减少战争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危害。同时，在战争进程中，密切注视着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社会状况、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状况发生的种种微妙的变化，及时调整军事战略，使国家始终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借以保证军事战略上的主动权，保持战略优势。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阐述战争谋略的过程中，对战争谋略的最高层次——战略运筹问题，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通过作者的论述，使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中早就孕育着的、朦胧的国家战略的概念，变得比较清晰、比较完整起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